

doi:10.3963/j.issn.1672-8742.2019.01.002

#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文化自觉

吕林海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9)01-0004-05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崛起与前行,中国高等教育也迈进了新时代。新时代是一个努力向前的时代,是一个不断远眺的时代,更是一个求新求变求发展的时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在新时代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争先创新。但是,在向前眺望和奔跑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向后看”,需要不断审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传统,直至我们的文化。回望传统和文化,不是一种“乡愁式的”复古和倒退,而是为了更好地审视现在、更好地把控未来。

1997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主张,旨在提醒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冷静思考和自觉认同之态度,并强调,唯有如此,才能增强中国人的自主适应能力,才能确保中国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真正找到自己前行的坐标<sup>[1]</sup>。时间过去了20多年,费老当年提出的精辟见解越发彰显出思想的时代光芒。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在中国日益崛起的新时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及其研究如何在全球发展格局既充满激烈的多级竞争、又日益走向“命运共同体”的扭结交织中,寻找中国教育文化蕴意,彰显中国教育文化品质,构建中国教育文化方案,以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为全球文化贡献中国智慧,这是对当代中国高教学者智识、勇气和胸怀的全面考量!

## 一、差异的审视: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教育问题的困境

文化自觉始于文化自省,而自省必须源于对差异的审视。中国高教学者必须要学会在“中国的教育问题”和“西方的教育理论”之落差中勇敢地展开一种“文化自审”及至“文化自省”。之所以在中国问题和西方理论之间存在着“文化落差”,是因为,理

---

作者简介:吕林海(1977-),男,江苏南京人,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学课程、教学与学习。

论是一套观念体系,它在根本上受到理论建构者及其所处群体(亦即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思维、语言、文化及其教育等方面的限制。因此,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很多理论模型都不能普遍地适用于拥有不同思维、语言、文化背景中的人,包括格尔茨、马尔库斯在内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用充分的证据证明了上述观点<sup>[2]</sup>。

最能体现这种“文化落差”的重要例证,恐怕非“中国学习者悖论”这一提法莫属。1996年,一批大学学习与教学研究领域的世界顶尖学者(如约翰·比格斯、F.马顿、戴维·沃特金斯等)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学习者:文化、心理和情境的影响》的重要论著,该书即是一个源自写作者“文化落差”体验的直接产物。本书写就于1990年代,包括马顿、比格斯在内的撰稿者们都已在所属国家(如瑞典和澳大利亚等)的大学中陆续退休。而中西文明交汇之地的香港,却把这些学术精英网罗于彀中,将他们返聘至港岛各大学。这些西方学者在定居香港之后发现,他们过往精心构建的“大学学习与教学理论”,竟然在东西文明并存之地的香港出现理论上的“水土不服”现象!比如,在西方背景下,强调理解和思考的“深度学习”,会导向优质的学习结果;而强调记忆和考试的“浅层学习”,会导向劣质的学习结果。但在中国背景下,“浅层学习”似乎并不“浅”,浅层学习中蕴含着深度学习,深度学习中也埋嵌着浅层学习,并且,“同时使用深层法与浅层法的中国学生”,要比纯粹使用“深度学习”的学生,表现得更加优异<sup>[3][45]</sup>!这些困惑激发了这些学者的“文化好奇”,重燃了他们的研究热情。他们所做出的“面向中国学习者”的大量颇具新意的成果,虽然有些“文化隔膜”,但却拉开了一道中国教育与中国文化的景观幕布,展现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领域,并由此激活了当代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意识!

在研究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其实也认识到了,他们过往所构建的庞大而精致的教育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西方社会、西方教育和西方学生,但未必能充分而恰切地解释“中国教育和中国人”。他们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诸如“深度学习”等西方颇具共识性的概念,未必在东方和中国情境中有着与西方一致的意义。他们呼吁:“文化”是深嵌于教育冰山之下的“基因底座”,西方教育研究者应跳出“客位化”(etic)(站在中国文化之外去解析中国教育现象)的立场局限,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教育概念就可以顺畅地推广到东方情境之中,而应真正从“主位化”(emic)(沉浸到中国文化之中)的视角去审视、辨析、甚至是产生具有“文化相关性”(culture-specific)的教育概念,从而构建出真正有解释力和穿透性的中国教育理论体系<sup>[4]</sup>。

## 二、传统的体悟:中国文化孕育中国教育现实的特质

“主位化”视角不但对西方学者提出了挑战,同样也对中国高教学者赋予了思想启迪。“主位化”研究有效落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本土研究者要有本土的文化意识,要对中国教育赖以生根的文化传统有着更加自省的态度和更加深厚的理解。具体而言,中国本土高教学者需要从两条“古今联系”的路径落实“主位化”视角,以形成对传统的深度体悟和理解。

第一条路径是古典智慧的当代攫取。中国古代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灿烂的中国教育文化精髓,今天的中国高教学者理应从古典智慧中开掘出对当今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论断:“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他意在提醒中国学术界,“我们应该做一个传统文化根植下的现代人,即在承袭传统智慧中做现代化的中国人。”<sup>[5]</sup>中国的古典智慧中充满了辩证、联系、中庸、和合、变易等原创要素,它们构建出了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伦理的独特架构,这对今天我们思考中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教学方式、课程设计、教育评价等极具启示意义。

第二条路径是当代教育的传统链接。当我们在理解今天发生在中国大学教育现场中的各种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拿起西方的教育理论之武器,更要将当代的教育现象链接到中华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从与传统的勾连之中找到中国当代教育现象发生的合理性和根基性。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伯特在其名著《思维的版图》中,用“隐喻”的方式对中西方人的当代行为和心理差异做了精辟的概括:“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异在于,中国人把世界看成一个圆,西方人把世界看成一条直线”。他用了毕生的精力做了大量的跨文化比较实验,并反复证明,中国人用一种变通、迂回、整体、情境的方式思考问题、立命处事,而西方人则更关注简单、控制、规则、确定,“人类的认知并不一样,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在塑造着今天的不同族群。”<sup>[6]</sup>在今天的中国课堂上、学校里所发生的很多教育景象,既带有跨文化的教育普适性意义,但更带有文化特定性的独特要义。很多繁难棘手的教育议题之探讨,需要进行朝向传统文化的“回溯性”挖掘,只有在现代和传统的往复勾连之中,我们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当代中国教育问题乃至困境的“文化药方”!

综上所述,无论是第一条路径的“返古开掘”,还是第二条路径的“以古鉴今”,其实都要求我们珍视中华古老的文化传统,敦促中国高教学者在古今关联之中寻找中国教育发展之正途。赛格尔说得好:“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经历的是一种基于文化的学习。”<sup>[3]64</sup>文化,永远是教育研究者必须要穿越的“思想之桥”!

### 三、格局的涵育:全球发展彰显中西教育研究的互哺

上述体悟传统的两条路径,蕴含或包裹在中国高教研究者的一种宏大格局之中。格局是一种审视教育的图式、框架、结构,但格局更是一种胸怀、气度、眼界。中国高教研究者要涵养两种格局:一种是“文化互哺格局”,另一种是“全球命运格局”。

“文化互哺格局”是一种对中西文化和中西教育之关系的深刻建构。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文明的终结”之论断显然过于偏激,其所导向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已备遭诟病。亨廷顿所提倡的“文明的冲突”,尽管已经认识到了东方文明的重要影响,但其所内隐的一种文明抵抗心态和提防心理似乎也格局过小,不符合今日世界之发展大势。笔者赞同加拿大著名学者许美德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提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鲜明主张。她反复强调:任何一种文明一旦固化、封闭,就必然僵死;任何一种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文明,都是在与其他文明的观照、互动、对话之中不

断完善、不断勃发的<sup>[7]</sup>。只有深切体悟与践行“文化互哺”的时代蕴意,中国的高教研究者才能建构出一种更加健康、更为博大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

“全球命运格局”显然是“文化互哺格局”的自然延伸。文化互哺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加美好和幸福的全球社会,使全球公民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今日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的重大使命就是为全球社会的和平、公正、团结贡献力量。对于当今的世界发展格局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确定与变动同在,各种张力彼此拉扯,价值困惑深嵌人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渗透的正是一种“教育要为全球可持续共同发展做出贡献”的核心思想,其与《富尔报告》、《德洛尔报告》的思想主旨一脉相承,展现了一种对全球人类的生命、尊严、权利以及文化的深切体认<sup>[8]</sup>。中国高教研究者秉持的“文化自觉”,必须要超越“中华文化的小格局”,而应走向“全球文化的大格局”,要在全球的文化互动、文化对话、文化共生的大框架及大视野中,体会中国文化对当代教育的价值、把握中国文化对世界教育发展的贡献、建构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意义,展示当代中国高教研究的文明关切和全球胸襟。

#### 四、理论的建构:本土深耕培植中国教育理论的生成

审视差异、体悟传统、涵育格局,最终还需要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理论产品,这包括构建出能体现中国本土教育文化特质的概念、观点乃至思想。要实现这一理想,需要中国高教学者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本土的深耕:一是要有挑战自我的勇气。构建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创理论,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学术创生过程,无现成的概念框架、调研工具、理论体系可资直接借用,这考验着中国高教学者的胆识和信心。本土化的原创过程很可能是艰苦的、寂寞的、缓慢的,但中国教育的深层文化韵味正是需要研究者依凭着这份踏实、耐心、坚守,在深度的钻研和运思之中慢慢萃取出来,并使其最终散发出绚烂多彩的极致光芒;二是要有本土研究的意识。本土研究起源于对本土问题的自觉发现,进而用问题引领出研究的角度、立场、概念和方法,这不仅仅是一种本土化研究的问题自觉意识,也是一套本土化研究的程序自觉意识;三是要有洞悉本土的方法。很多带有强烈中国文化色彩的教育概念,如“沉默”、“谨言慎行”、“亲师度”、“努力美德”等,都必须进入本土场域之中进行观察、对话、体悟、提炼、反思,随后才有可能开发量表进行定量研究,当然进一步的定性研究将继续丰富后续的认识,因此定性-定量-定性……的往复性的贯通性方法,是展开原创性的本土研究的必要方法;四是要有文化比较的视角。比较是一种凸显特质的重要“手筋”,它推进了本土深耕中的原创理论的精致化和深刻化。笔者近年来所做的“中国学生的美德学习范式研究”、“中国学生的沉默学习研究”、“中国学生的融合性学习研究”等,都力图通过一种文化比较的视角,展现中华文化滋养下中国学生独特的学习面貌,凸显中华文化要素的生命力与智慧性,力图产出一批能与全球教育并行对话的教育文化产品,并着力为全球教育学术发展贡献中华文化的力量和精神力量<sup>[9-10]</sup>!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11-17.
- [2] 翟学伟. 关系与中国社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7.
- [3] 吕林海. 融合性学习: 西方学生的梦魇, 抑或中国学生的圣境[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8(2).
- [4] Watkins D. Learning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Research: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Watkins D. & Biggs J. (eds.), The Chinese Learner: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M]. Hong Kong: CERC,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10-21.
- [5] 楼宇烈.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3.
- [6] 尼斯贝特. 思维版图[M]. 李秀霞,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序言.
- [7] 许美德, 潘乃容. 东西文化交流与高等教育[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引论.
-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1-3.
- [9] 吕林海, 张红霞. 中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参与的特征分析——基于12所中外研究型大学调查资料的比较[J]. 教育研究, 2015(9): 51-63.
- [10] 吕林海. 转向沉默行为的背后: 中国学生课堂保守学习倾向及其影响机制[J]. 远程教育, 2016(6): 28-38.

(收稿日期: 2018-11-10; 编辑: 荣翠红)

(上接第3页)

其实说到底, 还是要追问高等教育研究的初心何在? 本意何在? 英国学者马尔科姆·泰特所撰写的《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一书, 揭示人们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不外四个动机: 其一是“高等教育活动自身需要研究”; 其二为“源于研究兴趣”; 其三旨在“获得‘资质’(credit)”; 其四看重“研究成果的发表”。<sup>[2]</sup>今天, 当我们讨论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使命与学术生态问题时, 我们不得不寻根溯源, 反思、检讨一下高等教育研究的本意是什么? 是要研究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探索变革的思路与策略? 还是纯粹“源于研究兴趣”和“学术情怀”? 或者, 是为了获得某种“资质”? 是为了获得晋升、发展的资本? 追问研究的本意, 研究的目的, 有助于我们廓清迷雾, 凝聚焦点, 有助于回归研究之道, 进行真正科学的有价值的研究, 杜绝假、伪研究的产生。

## 参考文献

- [1]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 美英德高等教育[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2] [英]马尔科姆·泰特. 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33-234.

(收稿日期: 2017-11-30; 编辑: 伊夫)